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東北師範大學  
圖書館館史  
1946-2006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

## 第一章 1946-1950年，初创与成长时期

### 第一节 东北大学图书资料室的设立

#### 东北大学成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东北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企图抢占东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关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先后从延安、华北、山东派遣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8月，毛泽东亲自到延安大学，向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传达中央决定，要延安大学搬到东北，办东北大学。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对延安大学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就创办东北大学作出了具体的指示。这样，延安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组成了东北建队的队伍，行军编号是“松江支队第四大队”，告别延安，向东北进发。

1946年元旦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指示舒群聘请张松如、白希清筹备创办东北公学。1月上旬，东北局决定由白希清任东北公学校长，舒群任副校长，张松如任教育长。经过短期筹备，在本溪市创办了东北公学，并于1946年2月开始招生。不久，东北局又决定，将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张松如为教育长。此后，由于战火纷飞不断，学校几经辗转，先后转移到安东（现在的丹东市）、通化、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于1946年6月1日到达佳木斯市。同年8月，张如心率领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部分教师、干部百余名

来到学校，张如心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

## 东北大学图书资料室的设立

东北大学转移到佳木斯后，还没有图书馆的建制，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在教务处下设立了图书资料室，李石涵任主任，吕潼任副主任。起初，资料室只有图书数千册。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如心等人从延安和华北联合大学带来的，有一些图书是珍贵的革命文献；再一部分是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刊；还有长春、旅大、哈尔滨等城市中苏友好协会出版的进步书籍。

图书资料室是学校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为学校教学服务。资料室采购的各种书刊，一部分发给学生个人，一部分放到阅览室，供师生阅览。在李石涵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编写出版了《文章选读》、《纪念一二九专刊》、《从七·七到八·一五》、《现代民谣选》、《地主血腥发家史》、《五四纪念文辑》等。其中有的书如《从七·七到八·一五》，由东北新华书店公开出版发行。李石涵同志还亲自带领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一起收集材料，进行分类，编辑成册或通过油印小报、学习园地等形式，及时地向全校师生进行生动、具体的宣传报导，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图书资料室成立后，除了配合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外，还面向社会开展服务工作，先后为《东北文化》杂志和《合江日报》提供资料。

当时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人员，除正副主任外，只有干事禹哲一人。不久，吕潼、禹哲下乡参加土改，调来郭武成任干事。1947年春，郭离任，调来陈杭接替。后来又调来佟英明、宋广应、宫绍辉、南吕、贾茹、单行等人。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

## 东北文化社的资料库

为了传播革命文化，满足学生和东北青年对革命思想、科学知识的渴求，学校同佳木斯文化艺术界联合成立了“东北文化社”，编辑出版了《东北文化》杂志，张如心、萧军、姜君辰、塞克、吕骥等任主编，吴伯箫任编辑，《东北文化》1946年10月10日首次发刊。东

北大学资料室承担了该社资料室的任務。《东北文化》杂志各期所载资料性文章，凡署名为“本社资料室”者，盖出自李石涵之笔。《东北文化》为学生和社会青年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深受东北大学学生欢迎的读物，在东北青年中颇有影响。

### 各学院小图书室

学校各个学院还设有小型图书室，由学生会组织学生管理。图书室里存放着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革命的、进步的书刊，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整风文献》，鲁迅的《阿Q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孙犁的《白洋淀》，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从“九·一八”到“七·七”》、《从“七·七”到“八·一五”》、《合江日报》等。这些书刊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图书室内常常是座无虚席。

## 第二节 东北大学图书馆的成立

### 东北大学与吉林大学合并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7月3日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通令各级党政组织，决定将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合校，定名为东北大学。任命张如心为校长，何锡麟为教育长，张松如为副教育长。

1948年7月中旬，东北大学由佳木斯迁往吉林市。7月25日，举行合校典礼，当晚，全体教职学员在校园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

### 东北大学图书馆成立

东北大学与吉林大学合校后，藏书4万多册的原吉林大学图书馆与东北大学图书资料室合并，正式成立了东北大学图书馆。1948年7月19日，学校任命吴伯箫为图书馆馆长，李石涵为副馆长，从此，图书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大学图书馆成立初期的工作人员有：原东北大学图书资料室的单行、南吕，原吉林大学的朗朗天、褚鹏翼、傅彬华、戴玺、赵长青等。他们的分工是：单行负责行政；南吕、朗朗天负责图书分编；

褚鹏翼、傅彬华、戴玺负责出纳和阅览室；赵长青负责装订和卡片印刷工作。

图书馆成立后，为了便于管理和利用，将两校合并的藏书进行了统一分编。原东北大学图书资料室藏书只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号，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书采用的是日本森清十进分类法，只分到二级类目，而且其中一部分图书并没有经过分编。经研究决定，暂时沿用森清十进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由于图书馆的人手有限，组织学员参加，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统一分类和以前未编图书的整理编目工作。

## 第三节 两级藏书体系与分馆

### 校院两级藏书组织和服务体系

1948年10月22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精神，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学师资由东北大学负责培养。”并且确定东北大学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东北教育部直接领导，省委给予协助。这次会议对东北大学向正规化方向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东北大学开始走向正规化的过渡时期。

学校遵照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划分为三个教育单位。即：1、第一部，本科；2、第二部，短训班；3、大学预科。第一部，设有文艺系、社会科学系、自然科学系。各系都成立了资料室，归系领导。同年年底，学校又将文艺系改为文学院，社会科学系改为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系改为自然科学院。系资料室也随之改为院资料室，归院领导。这样，学校形成了校（馆）院（室）两级藏书组织和服务体系。

### 第三部图书馆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大学在长春设立了东北大学



第三部，主任张松如，副主任李先民。将原长春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的留长教职学员编入东北大学。原长春大学图书馆改称为东北大学第三部图书馆。学校从吉林派孙健到第三部图书馆同原长春大学图书馆刘桂、隋永禄一起工作。随后，李石涵也到长春，兼任第三部图书馆主任。

长春大学是国民党部队1946年占领长春后建立的，长春大学图书馆接收了伪满建国大学、政法大学、新京工业大学、大陆科学院等单位图书馆残存的图书，其中以建国大学藏书为主，共9万多册。这部分馆藏中的伪满日文图书成为我馆藏书的一大特色。

1949年初，单行从吉林到长春，负责第三部图书馆日常行政工作。之后，原在长春从事地下工作的陈雅光也到图书馆工作。同年7月，图书馆随学校从吉林迁来长春，第三部图书馆并入校图书馆。

## 图书分馆

1949年1月24日，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吴伯箫离馆，专任文学院副院长，陈元晖教授继任馆长，陈雅光任秘书，宫绍辉任总务股股长，王东桂任编目股股长，单行任典藏阅览股股长。图书馆共有工作人员17人。馆藏书刊达220,387册，其中中文书75,169册，中国古籍54,978册，日文书48,696册，俄文书1,669册，西文书12,074册，期刊27,801册。

东北大学在长春的学校校址非常分散。为了便于对师生服务，在距图书馆较远的文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分设图书室（也称图书分室）。两院专业图书，由图书馆（也称总馆）拨给。

1950年3月，两院图书分室改为图书分馆（简称分馆），并在社会科学院增设分馆。分馆设主任，由教师兼任。文学院分馆主任为孙常叙，自然科学学院分馆主任为李国栋，社会科学院分馆副主任为李洵。每个分馆有工作人员4至5人。分馆受总馆和学院双重领导。总馆尽量把专业图书拨给分馆，采购和分编工作仍由总馆统一进行。为加强领导，经常召集总、分馆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重大问题。

## 第二章 1950-1956年，向正规化迈进

### 第一节 统一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 东北大学易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国高等学校都面临着如何适应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使学校走向新型正规化的问题。

1950年3月28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奉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并经教育部同意，自4月1日起将原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原东北大学校长张如心、副校长张德馨仍为东北师范大学正、副校长。”学校易名后，以培养新型中学师资为目标。

东北大学图书馆随学校易名而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 分馆统一

1950年10月，学校决定取消学院建制，各系直接由学校领导。

取消学院建制后，原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两个分馆合并到总馆，原自然科学学院分馆由于地处偏远仍然保留，但是划归总馆统一领导。

从此，总馆的任务进一步加重了，于是把原来的三个股改为四个科一级的组织：总务组，组长宫绍辉；采购组，组长单行；编目组，副组长王东桂；典藏阅览组，副组长山河。编目组之下，又分设分类与编目两股；典藏阅览组之下，又分设典藏与出纳两股和一室（装订室）。至此，全馆共有干部33名，藏书294,583册，其中中文书45,149册，中文线装书53,993册，中文善本书1,538册，日文书89,603册，俄文书2,540册，西文书12,378册，期刊28,800册，教材60,537册，图书馆已初具规模。

### 第二节 图书馆的正规化进程

在学校不断走向正规化的过程中，图书馆也逐步迈向正规化的道路。正规化的图书馆，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管理方法。对于浩如烟

海的馆藏，必须进行统一的分类、编目，科学的整理加工，才能便于管理和利用。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此外，还要有健全的服务体系，方能有效地为全校读者服务。以上这一切工作，又都依赖于正确的方针政策。图书馆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必要的探索。

## 图书分类法的确定

建馆初期，我馆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浩瀚的馆藏，来源于许多单位，所用分类法不同，分编粗细各异，分编与否并存，结果形成无法统一管理、读者难于利用的混乱状态。

摆在图书馆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统一分编全馆藏书，但又苦于没有一部符合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和科学观点的新分类法。当时我馆曾写信给前苏联列宁图书馆询问和请求帮助，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即使得到前苏联的分类法，也不一定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李石涵研究比较了几种分类法，如刘国均图书分类法、皮高品图书分类法、王云五分类法、杜定友分类法，以及日本森清十进分类法等等，还研究了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总书目》的分类体系。从1949年秋季开始到1950年，在李石涵的领导下，编写出一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参加分类法编写的人员主要是李石涵和王东桂二人，此外李洵、单行等人也参加了部分类目的起草工作。分类法由王东桂统稿，李石涵定稿。当时认为这部分类法吸收了十进分类法便于记忆、便于检索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刘国均等分类法思想体系陈旧的不足。自编分类法在使用之前，曾印发给各系征求意见。

除了这部分类法以外，李石涵还参考刘国均分类法自编一部中国古籍分类法。

我馆自编的这两部分类法确定以后，即集中人力从1950年4月起分别对三个学院分馆的图书进行整编，之后又对总馆的图书进行整编，到1951年2月止，共编出图书183,073册，基本上把馆藏常用图书分编完毕，这就为图书馆的藏书组织、管理、流通利用奠定了基础，为图书馆正规化管理创造了必要条件。

至于俄文图书，由于不久就得到了前苏联罗帕夫斯基《十进分类法》，它比较适用于俄文图书，就采用了该法，对馆藏俄文图书重新进行了整编。



## 规章制度建设

一所正规大学图书馆，一定要有系统而完善的规章制度。李石涵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起草了《东北大学图书馆办事细则》，并主持起草了《东北大学图书馆借书条例》、《东北大学图书馆遗失损坏图书赔偿条例（草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组织条例》、《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组织规程》等，为以后系统地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 借阅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的效能，图书馆强调把复册少、借阅量大的专业图书尽量放到有关阅览室里，以促进流通。在成立典藏阅览组以后，系统地建立起了师生阅览体系。

图书馆一共分设五个学生阅览室和三个教员参考室，以及报纸阅览室和杂志阅览室。第一学生阅览室，存放历史、地理方面专业图书；第二学生阅览室，存放社会科学、哲学方面专业图书；第三学生阅览室，存放文学和少量其他各类图书；第四学生阅览室，存放自然科学方面专业图书；第五学生阅览室，存放俄文图书。第一教员参考室，存放社会科学方面图书；第二教员参考室，存放文学方面图书；第三教员参考室，存放自然科学方面图书。这些阅览室都采取了开架管理，图书很少有丢失现象，读者感到非常方便。只有第四阅览室，由于地处偏远，管理不善，发现了丢失《资本论》第三卷之类的图书，后来改为闭架管理。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并强调“大军未发”，要“粮草先行”，指明了图书馆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馆通过内阅与外借、个人借书与集体外借、本馆借书与馆际互借等多种服务方式，尽量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例如，1956年借出图书402,888册，其中借书处借出图书154,354册；1956年建立有馆际互借关系图书馆33个，借入图书1,095册，借出图书1,024册。

## 领导班子调整

正当图书馆朝着正规化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馆一级领导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化。1950年李石涵和陈元晖相继离馆，杨公骥和李洵同时到馆，杨公骥任副馆长、代理馆长职务，李洵任馆秘书。1951年春，陈雅光离校，宫绍辉接任秘书工作。

1951年9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学校派“三反”工作组进驻图书馆。1952年春，莽大龄、冯连惠任秘书，冯连惠兼任党支部书记。

1952年3月，在全校教师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由于“三反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图书馆出现了以党代政和使用干部宁“左”勿“右”的现象，把熟悉业务、文化水平较高的“三反”前的组长、秘书全部或撤换或调离或停止工作，致使工作受到损失。外埠采购出现了混乱，阅览室图书丢失严重，图书分编与出纳错误增多。

同年9月，杨公骥离任，张毕来继任副馆长、代理馆长职务。不久成仿吾来校。胡绍组代表学校党委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做了《关于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检查了领导工作中“左”的缺点和错误。后来陈静波又代表学校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就“三反”运动做了总结，并检查了扩大化的错误。此后，“左”的错误有所纠正。

1953年，宫绍辉、冯连惠、张毕来等人相继离馆，于达人任副馆长兼党支部书记。1954年任命单行为秘书兼采编组组长，赵克任典藏阅览组组长。

## 图书馆委员会

1955年3月，学校成立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委员会，校长助理丁锡祉任主任，于达人任秘书。图书馆委员会定期听取图书馆工作汇报，讨论图书采购等有关图书馆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发挥了参谋作用。

## 目录体系的完善

于达人到馆以后，组织人力编制了中文现代书书本式目录，共11册，2,357页，119万字，至1956年全部完成。

此外，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图书资料，还完善了目录体系。读者目录原有分类目录和书名目录，从1956年开始，对新进馆图书增加了著者目录，并开始补制已编图书的著者目录。1956年，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馆内临时成立了旧书整理委员会，倒出200平方米房间，抽调馆内3名干部，外雇14名临时工，集中对积压未编的十多万册中外文旧书进行了整理，至1957年全部完成。

### 干部培训

图书馆比较重视专业干部的系统培训。1955年初与长春市图书馆合作，举办长春市图书馆干部业余进修学校，我馆有20多名同志参加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毕业成绩。该校校长由市文化局局长兼任，于达人兼任副校长，单行兼任教导主任。该校对培养长春市各系统图书馆专业人才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培养图书馆专业干部探索出一条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新路。

1956年3月，于达人调离图书馆，郭学洁、单行任图书馆正副主任，郭学洁兼任党支部书记。馆领导继续加强专业干部培训，1956年9月派赵克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进修，在馆内成立了业务研究小组，建立起经常性的业务学习制度，并在时间上给予一定支持，收到明显的效果。

### 资料室建设

为了更直接更有效地为各系教学和科研服务，我校大力加强了资料室建设。1951年全校只有7个系建立起资料室，藏书6,912册。至1956年，系资料室扩大到11个，藏书达18万册。

## 第三节 图书馆办馆方向的确定

###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

在向科学进军的形势下，高教部于1956年12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明确了“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

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它是“标志着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走向新的阶段的里程碑”。

我馆郭学洁和单行参加了这次会议。单行还参加了预备会议和顾问组的《高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单行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长春市图书馆干部业余进修学校的办学经验，得到了大会的充分肯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高等教育》杂志1957年第一期发表《为进一步办好高等学校图书馆而努力》的社论指出：“就地取材，就地培养，是提高干部质量最稳定、最切实可行的办法。长春市所举办的图书馆业余进修学校，行政人员和业务教师都由有关人员兼任，在短期内便可使在职人员从业务上有所提高。这足为各地效法，而应加以推广的。”

1956年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推动我馆工作进一步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

### 图书馆方针任务的明确

想要办好一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是必须明确的一个根本问题。建馆之初，我馆只是简单地认为贯彻教育方针，配合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图书馆的方针任务。

1952年图书馆领导提出“主动配合教学”的方针，并确定“馆的工作三个重点，第一是教材供应；第二是一般书籍的借阅；第三是宣传资料工作。把教材供应工作提到首要地位。选购组以选购教材为主要任务”。当然只重视教师教学不重视学生学习，是不对的，但把教材供应作为馆重点工作的第一项，把选购教材作为选购组的主要任务，忽视教师教学与科研需要和学生大量阅读普通参考书的需要，同样是片面的。基于这一认识，当时中断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书刊和中国线装古籍的采购，这一错误做法以后被发觉并得到了纠正。

1955年，我馆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提出“图书馆是我校教师、学生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辅助机关”，1956年进一步明确了“本校图书馆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辅助机关。工作方针是保证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皆围绕这一方针进行”，“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保证教学与科研工作，两者不可偏”。直至1956

年12月，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高教部副部长刘皑风在大会报告中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工作方针任务，应该明确地规定为‘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至此，对大学图书馆方针任务的不同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为了适应大学图书馆学术性的要求，从此更加重视了专业干部的培训和注意了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活动。

## 旧大学图书馆的改造

自建馆以来，图书馆不断充实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籍；在接收敌伪藏书以后，注意清理了政治上反动、内容上淫秽、荒诞的书刊资料，改变了藏书成份；并注意宣传政治上进步、思想上健康、内容上科学的书刊资料。

早在1949年7月，学校正副教育长何锡麟、张松如即向各院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派教授到图书馆帮助审查图书，通知中说，对“宗教宣传……武士精神，虚假历史，想入非非的哲学等类著作”，要“加以整肃”。此后，图书馆对政治上反动、内容上淫秽、科学上荒诞的图书，多次邀请教师帮助审查。

1954年至1955年，馆领导明确提出并草拟出《按政治内容区分馆藏图书标准》，将馆藏划分为流通图书、资料图书和限禁图书等三类，并分别编目、分库典藏、规定借阅办法。这种审查、区分馆藏的工作，方向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由于当时的理论水平有限，再加思想上受“左”的影响，在1949年对日伪时期图书进行“整肃”时，不适当地销毁了一些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图书；在以后区分馆藏时，把一般资产阶级观点的学术性著作，也打入资料书库，限制学生借阅，这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辨别能力是不利的，这一失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有所认识和改正。

## 加强藏书建设

建馆以后，除了“三反”运动时期受到干扰以外，图书馆领导比较重视藏书建设。

1948年7月正式建馆时，图书馆仅有6万多册图书，1949年接收原长春大学、东北大学、日伪神武殿等处藏书以后，共有图书22万册，



以后每年年均补充图书10万册以上，至1956年底，馆藏图书已达1,206,946册，其中中文图书471,273册，中国古籍242,319册，日文书50,042册，俄文书39,486册，西文书35,946册，教材337,554册，期刊30,326册。

但在建馆初期，由于缺乏图书采购和管理经验，有复本偏高的现象，甚至采购前苏联文艺小说复本达一、二百册之多。经过几年的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有了认识和纠正。从1955年以后，“采取了坚决依靠教学单位与馆主动性相结合的购书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从1956年9月以后，选购与编目分设为两个组，加强了藏书建设。1956年学校经费又比较充足，图书馆依靠教师提出购书书目，并邀请教师与图书馆人员一起到外地采购，致使该年购书量达到235,589册之多，其中仅中国线装古籍即达51,901册，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馆藏，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 第四节 岩波书店赠书

岩波茂雄先生，是日本岩波书店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人民和中日文化交流怀着特殊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曾向上海分社社长表示：“作为日本人，我想为中国多少做点好事，并希望转告中国方面，在日本人当中也有怀着对中国的过去表示感恩，对日本军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愤慨和惭愧心情的人。然而我仅是一名商人，没有左右政治的力量，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将我倾注半生心血的出版物，提供给中国方面使用，请体谅我的心情，望你从中国的大学中选出五所，将我的书刊分别送给这五所大学各一种。”

之后，岩波茂雄先生又和当时驻日本的中国代表机构取得联系，最终选定了北平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作为受赠单位。正当岩波书店准备向中国五所大学赠书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赠书一事因此受阻。

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赠书之事再度搁浅。1946年4月25日，岩波茂雄先生带着未竟的心愿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告诫后人一定要将赠书的愿望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先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捐赠对象改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图书馆。我馆从1953年起，接受岩波书店寄赠的图书。这批图书为我校师生从事科学研究和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 第三章 1957-1966年，在曲折中前进

### 第一节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195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

1957年1月，我馆参加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郭学洁、单行同志在馆里分别传达了会议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全馆人员深受鼓舞，对图书馆工作的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加深，工作积极性普遍高涨。在书刊借阅方面，采取了“一切为读者”的服务方针，改变了单一的服务方式，实行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藏书组织和灵活多样的借阅方法。各系图书室也开辟了专业阅览室，在全校构成一个图书馆（室）网络。学校还成立了校长领导下的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后改称图书工作委员会），对图书馆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 第二节 1958年图书馆大搬迁

1957年年末，国家教育部批准我校新建造价120万元、面积12,000平方米的图书馆楼工程计划。设计图样公布于众，征求全校师生意见。

1958年初，我馆开始准备搬迁工作，于3、4月间由现在的东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吉剧团两楼分别搬到校园内的数学楼和外语楼（现在的文学院）。这是一次图书馆大规模搬迁，上百万册书刊的移动，必须保证分类排架次序不乱。为此，首先组成了搬迁领导小组，反复研究搬迁方案，准备工作充分，组织分工明确，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大搬迁的任务。

### 第三节 历次运动中的图书馆

#### 整风运动

1957年4、5月间，全校师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内整风运动开始。

5月19日，校党委第一书记、校长成仿吾作了党内整风动员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并希望全校非党同志给予帮助。我馆也积极开展了整风运动。

#### 反右斗争

在整风过程中，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全国对这种进攻进行了反击。

1957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我馆从6月25日至7月10日连续召开十次全馆人员大会，对所谓的馆内外“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把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馆内三名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9月，化学系马岳民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勇豪到馆任党支部副书记。

1957年12月，我校召开行政扩大会议，号召“以革命精神紧缩机构，精简人员，下放干部”。我馆先后有49人签名要求下放劳动。

## “双反”运动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3月4日，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成仿吾校长、丁浩川副校长分别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校“掀起一个反浪费反保守的鸣放辩论整改高潮”。随后，在我校立即开展了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勤俭节约运动。

我馆先后举办了两次全校性的“书刊浪费展览会”，揭示了我馆几年来在书刊选购方面存在着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同时，也展出了一部分严重被污损的书刊，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刻的爱护书刊的教育。在“双反”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康生到我校视察，以所谓“支援工业”为由，迫令停建图书馆大楼，这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的作用。

1958年4月，我馆典阅组借书处在人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开始建立图书流动站，即晚间下到学生宿舍为同学们办理借还图书工作。虽然每周仅一次，但每次都需要几个人白天坚持日常工作，晚间放弃个人的休息时间下流动站。同志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表现出很高的工作热情。

1958年5月，郭学洁、单行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助理，免去他们图书馆正、副主任职务。郭学洁继续兼任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勇豪继任副书记。

## 大跃进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20日，学校召开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东北师范大学（1958-1962）跃进规划要点》。

6月21日，我馆召开了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大会。会上各组组长汇报本组整风以来工作改进情况，并提出今后的“跃进规划”，还有许多同志发言表示跃进决心。典阅组提出在克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加下图书流动站次数，由每周一次改为每周下站三次。还决定在教职员宿舍设立“图书预约箱”和送书上门的服务办法，教师上午九点钟以前投进“预约箱”的借书条，当天下午4~5点钟将所借图书送上家门。选购组提出缩短验收时间，由几天缩短到不超过一天。编目组提出提高分编效率，西文编目从70种提高到90种，日文编目由70种提高到108种，还提出“快编快发”、“一切为了先出书”的口号，采取有关工序齐头并进，上下工序灵活分工及简化